关于“故宫学”学科建设的初步构想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中心（上编）

Initial Ideas for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Gugongology: Centering on The Palace Museum

王素　　Wang Su

内容提要：

“故宫学”博大精深。关于“故宫学”的学科建设，有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同时也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具有前瞻性，或者说必须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不能将其研究对象的时代局限为明清。理由很简单，就是历史本身是不能割裂的。既是“数典不能忘祖”，也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故宫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应该立足明清，更应该追溯历代。本文根据学科建设越来越细化的时代要求，先在“故宫学”之下分设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宗教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文保科学十个子学科，并举例稍加解说。但仅此也只是给“故宫学”支起一个简单粗略的框架。“故宫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大的细化空间，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关键词：

故宫学　学科建设　十个子学科　初步构想

ABSTRACT:

Gugongology involves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profound scholarship, so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would be an exploring process on the long-term basis. On the other hand, the basic principle should be adhered to that Gugongology would be a perspective and sustainable study without the limitation of the tim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e to the fact that history itself is no isolated or separated just as the proverbs say “One mustn’t forget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ir own country”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ast can guide one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Gugongology should date back from previous histories on the basi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answer to the more specific classifications of disciplines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his initial idea that Gugongology consists of ten sub-subjects —— history, archaeology, cultural relics studies, philology, religion studies, publishing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museology,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with brief explanation to each. Needless to say, it is just a rough framework for Gugongology, more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improve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Gugongolog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en sub-subjects; initial ideas

缘起

2003 年 10 月，郑欣淼先生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 70 周年举办的“博物馆馆长论坛”上，首次提出“故宫学”这个概念，当即引起极大的反响。此后，郑欣淼先生连续撰文，对“故宫学”的内涵和研究范畴进行了深入阐述，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05 年 6 月，北京故宫举办第一次“故宫学”座谈会，我十分荣幸地收到了邀请函，但由于出差在即，无法参加，提供了一篇书面发言。这次座谈会开得十分成功，不仅扩大了“故宫学”的影响，更推动了“故宫学”的发展[1]。此后，郑欣淼先生又将他有关“故宫学”的文章分门别类结集为四部专著陆续出版，使“故宫学”的内涵和研究范畴更加明晰，也使“故宫学”由学问向学科大步迈进[2]。2010 年 4 月，北京故宫准备举办第二次“故宫学”座谈会，我又十分荣幸地收到了邀请函。由于第一封邀请函将会议定名为“故宫学研讨会”，我准备了一篇名为《略谈故宫学的内涵与外延——以故宫文献学为中心》的文章。第二封邀请函将会议重新定名为“故宫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座谈会”，我的这篇文章就显得过于正式了。也许正是因为过于正式，才引起了郑欣淼先生的注意。会后，郑欣淼先生对我说，希望我能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一篇关于“故宫学”学科建设的较长文章。我答应了。这便是本文的缘起。

其实，关于“故宫学”的学科建设，也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正如郑欣淼先生《探索故宫学的体会》一文所指出：“故宫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为“故宫学”的学科建设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关于“故宫学”的学科建设，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具有前瞻性，或者说必须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这是因为，任何一门“学”，虽然都有可能存在小与大、狭义与广义、学问与学科的分别，但同时也都有可能存在从小的、狭义、学问的“学”，发展到大的、广义的、学科的“学”的变化。陈寅恪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时，“敦煌学”只是一个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约 5 万件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小的、狭义的、学问的“敦煌学”；而现在作为国家二级学科的“敦煌学”，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石窟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众多子学科的大的、广义的、学科的“敦煌学”，并且仍在持续发展。如果没有前瞻性，将“敦煌学”作为概念定格在 20 世纪 30 年代，“敦煌学”是不可能取得现在这么长足的发展的。而作为有着丰富内涵和宽广外延的“故宫学”来说，其学科建设，自然应该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谈到“故宫学”学科建设的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也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绝对不能将其研究对象的时代局限为明清。理由很简单，就是历史本身是不能割裂的。明清时期的任何典章制度，在之前的历代王朝大致都有渊源。既是“数典不能忘祖”，也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东汉王充《论衡·谢短篇》先批评：“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后批评：“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陆沈”的意思是思虑迂腐和不合时宜，“盲瞽”的意思是见识短浅和不明事理。二者都是“故宫学”学科建设的大忌。譬如近年提出的“长城学”和“长安学”。“长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明代的长城，因为现存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基本都是明长城。但是否可以将“长

1　张露、刘茵：《故宫研究、“故宫学”座谈会纪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4 期，140 — 155 页。

2　郑欣淼：《紫禁内外》、《故宫与故宫学》、《守望经典：郑欣淼谈故宫》、《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紫禁城出版社，2008 — 2009 年。本文的取材及论述，凡出此四部专著者，不再一一注明。

DA10070282-12-P322-329-cs4.indd 322-323　　11-2-14 下午5:21

城学”研究对象的时代局限为明代呢？我想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东起河北北部，西到甘肃敦煌，还有秦长城、汉长城以及其他历代王朝长城的遗址。此外，中原的河南甚至两湖还有春秋战国时期楚长城的遗址。因此，“长城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应该立足明代，也应该兼及各朝。“长安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汉、唐作为国都的长安，那么是否可以将其研究对象的时代局限为汉、唐呢？我想显然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中国的都城营建本有一定之规，各个王朝的都城也都含有彼此参照的成分。汉都长安含有秦都咸阳的成分，唐都长安本于隋都大兴，而隋都大兴又含有北魏都城洛阳和东魏、北齐都城邺城的成分。不仅如此，日本奈良的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又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营建的。因此，“长安学”的学科建设，同样不仅应该立足汉、唐，也应该兼及各朝。而“故宫学”的学科建设，则不仅应该立足明清，更应该追溯历代。

关于“故宫学”的学科建设，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学述略》一文中指出：“故宫学很显然是综合性学科，在研究中需要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建筑学、文艺学、美学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又指出：“故宫学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古器物、档案、图书、艺术、宗教、民俗、科技、博物馆等诸多自成体系的学科。”我现在就按照这个思路，根据北京故宫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科建设越来越细化的时代要求，先在“故宫学”之下分设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宗教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文保科学十个子学科，并举例稍加解说。不足之处，请大家补充；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一　历史学

历史学是一切科学或学科之母。因为今天发生的任何事，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任何科学或学科都有历史，“故宫学”当然也不例外。作为“故宫学”的历史学，至少可分历代宫廷史、明清宫廷史二大研究领域。此外，支撑明清宫廷史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也应纳入学科进行介绍。

（一）历代宫廷史

自古以来，宫廷就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地方。前代宫廷发生的事件，制定的典制，后代宫廷往往作为经验和教训，不断总结和汲取。因而可以说，没有明清之前的历代宫廷史，也就没有明清宫廷史。

1. 历代宫廷政治史

所谓宫廷政治，主要是指以宫廷为中心发生的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小则影响朝庭，大则动乱天下，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1）皇位争夺

皇位争夺，最为普遍，即如汉、唐盛世，亦未能幸免。人所熟知者，在秦有胡亥杀兄，在魏有曹丕逼弟，在晋有八王争权，在隋有杨广夺宗，在唐有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在宋有赵匡义的“烛影摇红，斧声凿凿”。南朝刘宋皇位争夺最为惨烈，立国六十年，几乎从未停止，皇帝八人，就有四人不到二十岁即死于非命，骨肉相残，死者多达数十人，手段之毒辣，堪称旷古未见。

（2）女后干政

女后干政，也不鲜见。西汉的吕后，东汉的邓后，西晋的贾后，东晋的褚后，北魏的冯后、胡后，唐代的武后、韦后，北宋的高后，辽国的萧后，较为人所熟知。其中吕后，由于是与高祖“共定天下”，干政少受非议，虽未代汉称帝，但《史记》、《汉书》均入“本纪”，已享受帝王待遇。至于武后，对唐并无寸功，代唐建周，登基称帝，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颇有争议。

（3）外戚擅权

外戚擅权，历代皆有。王莽以外戚篡汉建新，杨坚以外戚篡周建隋，可以不论。外戚擅权，以两汉最烈，西汉的窦婴、田蚡、霍光、上官桀，东汉的窦宪、阎显、梁冀、窦武，为其较著者。自此以下，北魏的高肇、唐代的杨国忠，亦为人所熟知。高肇为患，仅在“颇结朋党”，尚无大碍。杨国忠为患，导致“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千载之下，也难逃骂名。

（4）宦官之祸

宦官之祸，明清以前，以东汉、唐代为最烈。其实，西汉末年，宦官弘恭、石显与外戚许氏、史氏勾结，擅权乱政，已有前车之鉴。可惜东汉未惩其弊，开国之主光武帝即位伊始，仍亲信宦官，子孙相继效仿，终于宦官之祸与国相始终。然而东汉宦官之祸，尚不及唐代之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说：“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可以想见。

2. 历代宫廷典制史

所谓宫廷典制，主要是指以宫廷为中心制定的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历代既有沿袭，也有变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皇帝制度

皇帝制度包括皇帝的继承、培养、冠婚、寝食、朝会、节庆、出行、舆服、仪卫、祭祀、丧葬、陵墓等多种制度。以皇帝继承制度为例，历代均不尽相同，除了理想的尧舜“禅让制”外，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嫡长子制”，此外，还有汉武帝始创、北魏遥相继承的“立子杀母制”，夏始创、商盛行、北齐遥相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而立嫡立庶，立长立贤，也是历代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

（2）后妃制度

后妃制度除了后妃的遴选、聘娶等外，其它类别与前述皇帝制度大致相同，可以参照。其中后妃遴选制度最受统治者重视[1]。先秦后妃遴选较为复杂。西汉开始从民间遴选。东汉建都洛阳，《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实开明选民女、清选秀女之先河。惟赵宋有惩汉、唐女后干政和外戚擅权，后妃遴选重德、重出身、重门第，后妃多出名臣名将之家。故《宋史·后妃传上》说：“宋三百馀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3）皇子、皇女制度

1 按：《史记》、《汉书》均无“后妃传”，分别以后妃入《外戚世家》和《外戚传》，意谓后妃就是外戚。而此二者，都是统治者防范的对象。后妃遴选得当，不仅可免女后干政，甚至可免外戚擅权。后妃遴选制度最受统治者重视，主要原因应该在此。

DA10070282-12-P322-329-cs4.indd 324-325 11-2-14 下午5:21

皇子、皇女制度包括皇子、皇女的出生、命名、培养、婚嫁、分封、朝会、祭祀、舆服、仪卫、丧葬、陵墓等多种制度。其中皇子培养制度最受统治者重视。自秦开始设宗正官，汉承袭，属于九卿之一，专管皇子、皇女及宗族事务，皇子培养亦属事务之一。前面提到的北魏冯后，尤重皇子的培养。《北史·咸阳王禧传》说她曾“令皇子皇孙于静所别置学，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匡成之。”这就是《魏书·儒林传》说的“皇子之学”。赵宋包括皇太子在内的所有皇子都在专设的“资善堂”读书，经常请大臣名儒到“资善堂”举行讲座。

（4）宦官、宫女制度

宦官、宫女制度包括宦官、宫女的出身、选拔、教育、管理、退休、养老等多种制度[1]。其中宦官出身制度历代不尽相同。前面提到的西汉宦官石显，出自受过腐刑的刑徒。东汉宦官大致都是出身不限，地点不限，从小入宫阉为宦官，以给事黄门起家。唐代宦官多出周边属国及蛮荒之地。大宦官高力士的养父高延福原为高丽战俘。明代宫廷多高丽或朝鲜宦官，盖源于此。高力士本人为岭南人，宦官杨复光、吐突承璀均为闽人。当时将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一带少数民族称为“南口”，将这些少数民族阉为宦官供给宫廷称为“南口进献”[2]。

（二）明清宫廷史

明清宫廷与历代宫廷相比，文献史料保存较多，异见歧说流传亦夥，似乎更加充满神秘。明清宫廷发生的事件，制定的典制，也因此变得更加难以梳理。这既给学术研究带来难度，也给学术研究带来魅力。

1. 明清宫廷政治史

明清总结历代经验，汲取历代教训，宫廷政治总的来说比较规范，比较符合游戏规则。但政治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值得学术界深思。

（1）明宫廷政治史

明太祖朱元璋以草民得天下，惟恐有失，为了防止皇位争夺、女后干政、外戚擅权、宦官之祸四大封建痼疾，可谓煞费苦心，但仅防止女后干政、外戚擅权获得成功，防止皇位争夺、宦官之祸却很失败。

成功的原因在于法制与教育并重。如《明史·后妃传》开头即说：“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特别强调：“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同书《外戚传》也说：“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据明人余继登《典故纪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书记载，后之继位诸帝，亦均遵循无违。《内训》及《女诫》、《女宪》、《女训》之书，不仅盛行宫中，亦且流布天下。是故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无女后干政、外戚擅权之病。

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变通和忽略人性。朱元璋为防皇位争夺，先是固守“嫡长子制”，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后是标死，又固守“嫡长孙制”，立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允炆文弱，难当大任，最终导致第四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南京被攻陷，紫禁城化为灰烬，允炆亦被烧死。但《明史·恭闵帝纪》说：“或云帝由地道出亡。”又说：“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坊间更传明成祖派郑和六次出使西洋[1]，都是为了搜寻惠帝允炆（即恭闵帝）踪迹。朱元璋为防宦官之祸，定“祖训”，镌“铁牌”，堪称壁垒森严，动辄得咎。但《明史·宦官传》说：“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明代宦官之祸，非仅危害宫廷，更是屠毒天下，人所熟知，无须多说。宦官之祸所以难以避免，盖因皇帝、后妃身居深宫，与外界隔绝，惟宦官为最亲近、最能信用之人，仅靠“祖训”、“铁牌”，实难遏制人性。

1 余华清：《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 唐长孺：《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277 — 280 页。

此外，还有明末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三案虽然都发生在神宗万历（1573 — 1620 年）末年，但喧嚣扰嚷直至明亡（1644 年）仍未消歇，影响之深远，又非寻常宫廷政治事件可比。

（2）清宫廷政治史

清以外族入主中原，虽然文化存在差异，但是汉化速度极快，特别是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故宫廷政治事件远较前明为少。坊间盛传的清宫四大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乾隆出身”）或八大疑案（另加雍正、同治、光绪及慈安太后之死），多为有心人蓄意编织，未可尽信。

清代为防女后干政，严禁汉女入宫，长期维持部落政治婚姻。特别是总结前明成功经验。如康熙曾下圣谕云：“朕观《明史》，一代并无女后预政，以臣陵君之事。我朝事例，因之者多。”而后妃稳定，外戚亦难有所作为。故《清史稿·后妃传》称：“二百数十年，壶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此论大致属实。《清史稿》甚至没有《外戚传》（仅有《外戚表》），说明当时外戚无足轻重。至于慈禧干政，那是一个偶然或意外。

清代对宦官管制甚严。《清史稿·礼志七》记顺治元年定鼎燕京，称：“是日赐宴，有内监数辈先行拜舞，谕：‘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裁抑宦官自此举始。”顺治还曾谕曰：“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秦、汉以后，典兵干政，流祸无穷。”又在交泰殿铸铁碑，文曰：“（宦官）以后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凌迟处死。”即使如此，《清史稿·陶模传》还载陶模于光绪二十七年疏请裁减宦官，说：“宦官干政，史不绝书，我朝家法严明，从未有内监预闻政事。然除弊如除莠，留其芽孽，终恐发生，宜大加裁汰。内廷差使悉可改用士人，定宫府一体之制，永不再选内监，非唯一时盛事，实亦千古美谈。”故诚如陶模所言，有清一代，“从未有内监预闻政事”，更不用说宦官之祸了。

2. 明清宫廷典制史

明清总结历代经验，汲取历代教训，宫廷典制总的来说比较完善，比较方便官司操作。特别是《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均经过多次重修，记载宫廷典制极为详备，有的还有图说，给学术界研究明清宫廷典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明宫廷典制史

凡属皇帝、后妃、皇子、皇女、宦官、宫女的种种制度，与前述历代宫廷典制大致相同，可以参照。这里简单介绍皇帝继承制度和宦官出身制度。

1 按：据《明史》记载，郑和凡七次出使西洋，前六次均在成祖永乐中，第七次始于宣宗宣德五年，不为成祖派遣，故此处仅言六次。

DA10070282-12-P322-329-cs4.indd 326-327 11-2-14 下午5:21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皇帝继承，恪守“嫡长子制”，缺乏变通，导致“靖难之役”，已如前述。成祖以嫡四子身份夺得天下，终觉名不正言不顺，故仍实行“嫡长子制”。仁宗是成祖的嫡长子。宣宗是仁宗的嫡长子。英宗是宣宗的嫡长子（其母孙氏原为贵妃，胡皇后无子被废，孙被册为皇后）。英宗因“土木之变”被瓦剌俘获，其子宪宗尚幼，时属多难，国家需要长君，故景帝以宣宗庶次子（母吴贤妃）身份监国。但景帝毕竟不是嫡长子，英宗被瓦剌放回，后来得以复辟，这恐怕应是原因之一。宪宗是英宗的嫡长子。孝宗是宪宗的庶三子，因前面二兄早亡，得以继位。武宗是孝宗的嫡长子，荒淫无度，暴崩无嗣。世宗以支系入继大位，使明代帝系由“太祖系”、“成祖系”变成了“世宗系”。这种皇帝继承属于偶然，不能用制度考量。穆宗是世宗的庶三子，神宗是穆宗的庶三子，也都是因前面二兄早亡，得以继位。光宗是神宗的嫡长子。熹宗是光宗的嫡长子，死而无嗣（原有三子，但均早亡）。庄烈帝以光宗庶五子身份继位，亦属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总的看来，明代实行“嫡长子制”是很彻底的。

明太祖朱元璋贱视宦官，对于宦官之祸的防微杜渐，尤其煞费苦心。明前期宦官的出身多为外族，如高丽或朝鲜宦官，安南或交趾宦官，西北少数民族宦官，以及远承唐制的所谓“南口”宦官。即如成祖时著名宦官郑和，也是外族。《明史·宦官·郑和传》说：“郑和，云南人。”云南本属“南口”。而据研究：郑和原姓马，实为回族人。曾祖名拜颜，祖父、父亲均名哈只。祖父、父亲还曾去过麦加朝圣[1]。与郑和同时，还有宦官海寿、海童。海为回姓[2]，海寿、海童也应为回族人。宦官多选外族，原因很多，外族存在语言、文化障碍，难以与人沟通，也就难以作奸犯科，应为原因之一。明代中后期，随着宫廷事务的增加和藩王队伍的扩大，宫廷和王府对宦官的需求日益多起来，选用外省和京畿的以汉族为主的宦官才成为了时尚。藩王一般只能在本省选用以汉族为主的宦官。南、北宫廷只能在南、北京畿选用以汉族为主的宦官。其中，南宫廷选用宦官较少，似乎也很难得到重用。而北宫廷选用宦官甚多，且容易得到重用。因此，北京畿自宫求为宦官者，远较外省为夥。如果说，明朝前期的宦官之祸，主要由外族宦官所酿成，则可以说，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之祸，主要由北京畿的以汉族为主的宦官所导致。而这些，都是研究明代宦官所应注意的[3]。此外，明代宦官的选用与仕进，退休与养老，也越来越制度化，这应该是一种进步[4]。

（2）清宫廷典制史

凡属皇帝、后妃、皇子、皇女、宦官、宫女的种种制度，与前述历代宫廷典制大致相同，可以参照[5]。这里简单介绍皇帝继承制度和宫女选拔制度。

满清本为游牧民族，处强敌之间，也惟有强者才能生存，固无所谓“嫡长子制”。入关之前，太祖努尔哈赤虽以嫡长子承袭家业，但太宗皇太极却以第八子入继大统，世祖顺治（福临）亦以第九子入继大统。入关之后，圣祖康熙（玄烨）以第三子入继大统，世宗雍正（胤禛）亦以第四子入继大统。这对于满清来说，本属极为正常之事。但由于康熙曾将太子允礽几立几废，而诸子间又确实存在皇位争夺之事，所以才有“雍正夺嫡”之传闻。而雍正即位之后，不立太子，也并非自我作古，而是承袭康熙晚年旧制。《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四载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针对赵申乔请立太子而下圣训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清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说：“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实际也是“终清世不复立太子”。当时皇帝继承采用所谓“密建制”，即将储君名字写好，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等老皇帝驾崩之后取下开视，然后恭迎新君继位。乾隆即位，特别敕撰《古今储贰金鉴》，列举古今因建储导致的祸乱，以警戒子孙，说明“密建制”的必要性。中国皇帝继承制度，至此为之一变。

清朝宫女选拔，称为“选秀女”。《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七二说：“选秀女，顺治年间定。”论者遂多谓“选秀女”为清廷独创。实则如前所说，源自东汉“阅视良家童女”。区别仅在于：东汉“阅视良家童女”，一年一次，从国都洛阳乡中选拔，由中大夫、掖庭丞及相工主持。清廷“选秀女”分两种：一种一年一次，从内务府属旗中选拔，由内务府主持；一种三年一次，从八旗中选拔，由户部主持。此外，还有一种区别，就是东汉是从“良家”也就是家境较好的家庭选拔；清廷是从贫寒人家选拔。如《国朝宫史》卷二载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上谕说：“今日天气甚冷，应选秀女多系贫寒之家，尔等带至和暖处所，赏给热汤饭，毋致冻馁。”研究清宫廷典制，应该注意其渊源。

1 朱偰：《郑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年，24 页。

2 魏德新：《中国回族姓氏溯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年，43 — 44 页。按：回族海姓人物最著名者为海瑞。《明史·海瑞传》说：“海瑞，字汝贤，琼山人。”琼山在今海南省北，当时属于回族聚居地区。

3 任昉：《明代宦官籍贯与民族考论——明代宦官墓志研究之一》，《首都博物馆丛刊》第 15 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年，105 — 115 页。

4 任昉：《明代宦官选用与仕进探研——明代宦官墓志研究之二》、《明代宦官退休与养老考察—明代宦官墓志研究之三》，《首都博物馆丛刊》第 16、17 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2003 年，107 — 115、70 — 78 页。

5 参阅：清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年；清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三）支撑组织及单位

北京故宫未设支撑历代宫廷史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但设有支撑明清宫廷史研究的组织及单位，这就是清代宫史研究会和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

1. 清代宫史研究会

清代宫史研究会成立于 1989 年，机构设在北京故宫。成立之初，会员单位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市文物局（包括避暑山庄博物馆、避暑山庄研究所、避暑山庄管理处、外八庙文物管理处）、清东陵文物管理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2008 年新增会员单位有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天坛管理处、颐和园管理处。按照清代宫史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届学术研讨会的章程，至今已召开了九届学术研讨会。每届学术研讨会后，一般都要编辑出版一本学术论文集。其中，除第七届学术研讨会因与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联合召开，论文集由二会联合编辑出版外，现已编辑出版了六本学术论文集[1]。第七本学术论文集预计 2010 年下半年出版。此外，为庆祝故宫博物院 80 华诞，故宫博物院还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也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2]。

2. 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

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挂靠北京故宫宫廷部。中心成立之前，北京故宫就一

1 清代宫史研究会：《清代宫史探微》、《清代宫史求实》、《清代皇宫陵寝》、《清代宫史丛谈》、《清代宫史论丛》、《清代宫史探析》，紫禁城出版社，1991 — 2007 年。

2 故宫博物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

DA10070282-12-P322-329-cs4.indd 328-329 11-2-14 下午5:21

直非常重视明清史研究，并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创办大型年刊《明清论丛》，至今已编辑出版了九辑[1]。还于 2008 年 3 月 13 至 14 日在院内召开了“首届明代宫廷史学术研讨会”。中心成立之后，同年 10 月 21 至 22 日，又在北京召开了以“宫廷历史学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为主题的第一届明清宫廷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 12 月 18 日下午，中心还邀请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早期近代史系教授杜达姆（Jeroen Duindam）先生举行了题为“欧洲与亚洲王朝中心的比较研究”的学术讲座。

二　考古学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考古学，虽然迟至 20 世纪 20 年代才从欧洲引进，但其雏形实际早在西汉就已存在了。《汉书·郊祀志下》记张敞好古文字，利用美阳出土尸臣鼎考释周之褒赐大臣制度，既为金石学之始，亦为考古学之始。还有西汉的“孔壁书”、西晋的“汲冢书”，其整理与研究都运用了原始的考古学方法。而作为“故宫学”的考古学，其研究领域应主要包括古代宫殿、园苑、陵墓遗址考古以及其它相关考古。

（一）历代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中国古代的宫殿、园苑、陵墓，其营建规则，首先是继承，然后才是发展。《周礼·冬官》有《考工记》，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此处的“百工”，东汉属“司空”，故郑玄注称：“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续汉书·百官志一》司空条本注说：“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增加了“浚沟洫”（园苑有沟洫）和“修坟防”（包括帝王陵墓）。而东汉的“司空”，相当隋唐直至明清的“工部”。这就是说，自古以来，宫殿、园苑、陵墓的营建，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也都应有一定之规。因而可以说，没有明清之前的历代宫殿、园苑、陵墓遗址考古，也就没有明清宫殿、园苑、陵墓遗址考古[2]。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例介绍秦汉、唐元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1. 秦汉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现在的陕西和洛阳，秦汉宫殿、园苑遗址很多，不少都经过了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这里仅举二例：

（1）秦咸阳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秦始皇之前，历代秦王已在咸阳建筑了许多宫殿。秦始皇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又仿关东六国宫殿建筑了咸阳六国宫室。同时，扩建了城北的咸阳宫；后来，又在上林苑内新建了阿房宫。《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过去一直认为，咸阳的所有宫殿乃至园苑，包括咸阳宫、阿房宫，都在这场大火中毁灭。近几十年来，咸阳宫、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最近几年，考古专家针对咸阳宫遗址曾发现大片的红烧土遗迹，而阿房宫遗址未见同类遗迹，提出项羽烧的是咸阳宫而非阿房宫的观点，引起较大争论。

（2）汉长安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汉长安宫殿遗址考古最具代表性的是长乐宫和未央宫遗址考古。长乐宫在城东南，又称东宫，汉初为帝后所居，同时又为君臣朝会和商议军国事务的重地，惠帝以后改为太后所居。未央宫在城西南，又称西宫，惠帝以后为帝后所居，同时又为君臣朝会和商议军国事务的重地。《汉书·王莽传下》说：“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烧长安宫室市里。”汉长安宫殿乃至园苑也都在这场大火中毁灭。近几十年来，长乐宫、未央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现在，长乐宫、未央宫及相关园苑等辅助设施的基址大致都已勘探清楚，并可以据此绘制较为详细的复原图了。

2. 唐元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现在的陕西和北京，唐元宫殿、园苑遗址很多，不少也都经过了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这里也仅举二例：

（1）唐长安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唐长安宫殿遗址考古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明宫遗址考古。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北郊龙首原上，是唐代长安三大宫殿群之一。大明宫始建于贞观八年（634 年），是太宗李世民为其父李渊修建的，但工程未完，李渊就已去世。麟德元年（663 年），高宗进行扩建。此后二百多年，历朝皇帝多在此听政，是君臣朝会和商议军国事务的重地。昭宗乾宁三年（896 年）七月，被叛将李茂贞燔烧俱尽。近几十年来，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通过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初步弄清了大明宫遗址的范围和构造，并绘制了较为详细的复原图。大明宫宫墙周长约 7.6 公里（今北京故宫宫墙周长仅约 3 公里），四面共有 11 座门，已探明的殿、台、楼、亭及园苑等基址有 40 馀处，规模十分宏伟。

（2）元大都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这里特别提出元大都宫殿遗址考古，是因为元大都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元大都以金中都为基础，始建于世祖至元四年（1267 年），至元十一年建成宫城，至元十三年建成大城，然后全面营建大都，在世祖当政后期基本粗具规模。元朝末年，主要建筑均毁于战火。关于元大都遗址的调查，特别是宫殿遗址的调查，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开始。朱偰先生曾将自己关于宫城诸门及殿、阁、宫、池、苑遗址的调查结果绘图付梓[1]，开元大都宫殿遗址考古工作之先声。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有专家针对传统认为元大都在明清北京城西北，其中轴线也在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偏西的旧观点，提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的新见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后来经过考古，在景山北墙外发现了元大都南北大道亦即中轴大道的遗迹，纠正了旧观点，证实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也就是说，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系承袭元大都的中轴线而来。这样，元大都宫城的具体范围和宫殿、园苑的具体位置也就都可以探明和确定了。

1　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 1 — 9 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 — 2009 年。

2　刘庆柱：《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 年第 3 期，49 — 57 页。

1　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 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30-331
11-2-14 下午5:23

（二）明清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明清宫殿、园苑、陵墓与历代宫殿、园苑、陵墓相比，虽然时代较近，古建筑保存较多，但由于兵燹和人为破坏，毁坏废弃者亦复不少，仍有很多考古工作可做。清初顾炎武到昌平一带考察，曾著《京东考古录》，对明代北京东部边防设施的历史、地理情况以及后来的演变考之甚详[1]。可见考古与历史一样，今天的建筑设施，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古物，并不管其年代是否久远。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年代是否久远，其基本规则都存在继承关系。就像《考工记》提出的宫城营建的“前朝后寝”模式，实际为历代宫城所继承一样。譬如唐代大明宫南部为前朝，自南而北是含元、宣政、紫宸三大殿，北京故宫南部为前朝，自南而北是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均属《考工记》所说的“前朝后寝”模式。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例介绍明、清南北二京宫殿、园苑遗址、古建筑考古。

1. 明宫殿、园苑遗址、古建筑考古

现在的南北二京，明代宫殿、园苑的古建筑保存不少，遗址也有很多，可惜考古工作未能跟进，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这里仅举二例：

（1）明南京宫殿、园苑遗址考古

明南京城系由太祖朱元璋亲自主持设计建造。其新城、宫城建造，洪武二年（1369 年）九月开始，洪武六年八月完成。其外郭为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四月建，周一百八十里，有十六门。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关于宫城，《明史·地理志一》南京条说：“内为宫城，亦曰紫禁城，门六：正南曰午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这虽然只是大致情况，但据此已知较现在北京的紫禁城大得多。可惜后来全部毁于成祖的“靖难之役”。朱偰先生早年在南京调查六朝城郭、宫阙遗址，对明代城郭、宫阙遗迹仅提及而已[2]。之后，经过多年考古，也仅知宫城在钟山南麓，南北长 2.5 公里，东西宽 2 公里，内部建筑还是说不清楚。这些都足见这项考古工作之难做。

（2）明北京宫殿、园苑古建筑考古

明北京城系永乐四年（1406 年）闰七月始建，永乐十八年（1420 年）告成。《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说：“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门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门，第三重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这也只是大致情况。后来屡遭大火又屡经重建，原来的布局虽然未受大的影响，但终究产生了很多变化。要说明这些变化，就需要进行考古。朱偰先生早年曾对明永乐至崇祯朝的北京皇城及宫阙制度进行过详细考证[3]。侯仁之先生认为：明代紫禁城坐落在元大内旧址上，东西两墙的位置仍同于元大内旧址，与北京城墙南移对应，紫禁城南北两墙也分别南移了 400 米和 500 米。紫禁城中外朝三大殿与内廷后三殿与元朝大明殿及延春阁一样，均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充分体现了中轴线的核心地位[4]。侯仁之先生还对明代紫禁城宫墙外的中央官署进行了复原[5]。他们虽然均非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但做的工作实际都是考古工作。

1 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年。
2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 年；中华书局，2006 年。
3 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商务印书馆，1947 年。
4 侯仁之：《北京紫禁城在规划设计上的继承与发展》，《国学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523 — 534 页。
5 侯仁之：《明清北京城》，《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78 — 92 页。

2. 清宫殿、园苑遗址、古建筑考古

现在的北京，清代宫殿、园苑的古建筑保存很多，遗址也有不少，但似乎并未开展系统的考古，可做的工作很多。这里也仅举二例：

（1）清北京宫殿古建筑考古

清北京城虽系承袭明代而来，但紫禁城却基本属于重建。这是因为，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撤离北京前曾纵火焚毁紫禁城，当时仅武英殿、建极殿、英华殿、南熏殿、四周角楼和皇极门未焚，其馀建筑全部被毁。而《清史稿·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说：“紫禁城在焉。北枕景山，西衽西苑，苑有瀛台，太液池环之。南与端门属者曰午门。北神武门，东东华门，西西华门。午门之内，东协和门，东出为文华殿。西熙和门，西出为武英殿，旧曰雍和门，乾隆元年更名。其正中太和门，左昭德门、体仁阁，右贞度门、宏义阁。其内则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至乾清门止。东景运门，西隆宗门。凡此皆曰外朝，制也。”说的都是清末紫禁城内建筑保存情况。康熙时期，才对紫禁城被毁部分进行重建。乾隆时期，又对紫禁城进行大规模增建和改建。直至 1923 年，建福宫还曾发生火灾。1949 年后，也曾进行过一些局部改造。现在紫禁城内建筑，有多少属于原状，也只有通过考古才说得清楚。朱偰先生早年做过一些工作[1]，谢敏聪先生不久前也做过一些工作[2]，但都远远不够。特别是北京故宫正处“百年大修”阶段，每一项古建筑的维修，都必须以考古为先导，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2）清北京圆明园遗址考古

圆明园原为康熙皇帝赐与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的花园。乾隆时期进行大规模重修扩建，十六年（1751 年）增建附园长春园，三十七年（1772 年）增建附园绮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又曾续修。建筑总面积超过 16 万平方米，有园林风景百馀处，除有中国风格的庭院外，长春园内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欧式风格的建筑群。可谓园中有园，景中有景，极尽奢华，号称“万园之园”。可惜咸丰十年（1860 年）为英法联军毁灭大半。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八旗兵丁、土匪地痞趁火打劫，把园内残存的和正在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拆抢一空，使圆明园的古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现在仅存少数遗迹，供人凭吊。滕固先生早年曾获得该园被毁后不久由德国人奥尔莱所摄的长春园欧式宫殿照片 14 幅，并将其整理出版[3]。这种搜寻圆明园旧照片的工作直到近年还在进行。但这种工作主要是为了纪念。若想了解圆明园的原貌，需要做的还是考古工作。近几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勘察，期待能有好的成果。

（三）其他相关考古

前面谈的主要是遗址考古和古建筑考古。与“故宫学”有关的遗址考古还有窑址考古。此外，历史考古也非常重要，譬如院藏文物、文献的考古。

1 朱偰：《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 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 年。
2 谢敏聪：《明清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80 年；《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再研究（1403 — 1911）》，台北学生书局，1989 年。
3 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1933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32-333 11-2-14 下午5:23

1. 窑址考古

窑址考古是北京故宫的传统项目。这是因为北京故宫的文物收藏以陶瓷最为丰富。北京故宫窑址考古的先驱首先是陈万里先生，其次是冯先铭先生。陈万里先生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同时也是北京故宫窑址考古的开拓者[1]。冯先铭先生紧随其后，实地考查与文献整理并重，是我国同时也是北京故宫古陶瓷研究的开拓者[2]。以下还有李辉柄、叶喆民等多位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卓绝贡献，才使北京故宫成为世界收藏窑址标本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近年来，北京故宫后继有人，窑址考古仍在不断进行。2005 年 7 至 10 月，北京故宫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景德镇市丽阳乡彭家村、丽阳村的元、明瓷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07 年 3 月 20 日，北京故宫又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德清县武康镇火烧山原始青瓷古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文物考古

文物考古种类繁多。前述窑址考古，原本亦属院藏陶瓷文物考古的一部分。此外，由于两岸故宫藏有大量的玉器文物、藏传佛教文物，还有玉器文物考古、藏传佛教文物考古。玉器文物考古最有成就的是杨伯达先生。他对包括良渚文化系统玉器在内的史前玉器所作的考古研究人所熟知。其中，他最早提出“板块论”，即将史前玉文化分为东夷玉文化板块、淮夷玉文化板块、东越玉文化板块三大玉文化板块和夷、华夏、鬼、羌及荆蛮五支玉文化亚板块，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反响[3]。藏传佛教文物考古是北京故宫近年新发展的项目。目前已对四川甘孜、康巴等地区的藏传佛教文物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

3. 文献考古

文献考古也种类繁多。由于两岸故宫藏有大量的甲骨文献、金石文献及少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献考古至少包括甲骨文献考古、金石文献考古、敦煌吐鲁番文献考古。马衡先生为金石文献考古大家，早年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讲义，开近现代金石文献考古先声[5]，影响非常深远，直到近年仍为学术界研究之对象[6]。唐兰先生是甲骨文献考古与金石文献考古并重，最早提出甲骨文自然分类法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分期法，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7]。罗福颐先生也是金石文献考古大家，对于金文辨伪和古印整理贡献尤大[8]。此外，还有黄文弼先生，是高昌墓砖考古大家，关于他的贡献，下面谈文献学时还将提及。

1　陈万里：《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两木出版社，1990 年；紫禁城出版社，1997 年。

2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 年。

3　杨伯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按：2006 年 7 月 17 日，在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举办的“传授古玉鉴定辨伪理论与经验培训班”上，杨伯达又首次公开将三大玉文化板块改为四大玉文化板块，即：1. 东北夷玉文化板块；2. 东夷玉文化板块；3. 淮夷玉文化板块；4. 东越玉文化板块。

4　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故宫学刊》第 2 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389 — 407 页；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穿越横断山脉：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8 年。

5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原为北京大学史学系讲义，1924 年，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台北明文书局，1984 年。

6　孙亮球：《马衡金石学之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

7　唐兰：《殷墟文字记》，北京大学出版组，1934 年；《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7 年；《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8　罗福颐：《商周秦汉铜器铭文辨伪录》，香港中文大学影印，1981 年；《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 年；《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 年。

北京故宫既有大量的考古学资源，也不乏专业的考古学人才。譬如顾铁符先生，属于专业考古学大家，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参加过广东海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50 年代又先后参加过湖南长沙春秋战国时代楚墓和山西侯马东周墓葬群的调查与发掘，70 年代还参加过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发掘。因为所作田野考古多在楚地，对华中地区古文化特别是楚国文化的研究尤为精湛[1]。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1）1959 年西藏平叛不久，中央文化部组成西藏文物调查组首次入藏，顾铁符先生就是该组重要成员；1967 年他又第二次入藏，是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奠基人。（2）1972 年山东银雀山汉墓竹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相继出土，文物局成立整理组，顾铁符先生也是该组重要成员，在沙滩红楼从事简帛整理时间长达九年，为这批简帛的整理出版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惜的是，北京故宫目前还没有支撑考古学研究的组织及单位，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三　文物学

文物学与考古学关系密切。“文物”作为一个专门词汇，始见于《左传·桓公二年》：“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在这里，“声明”指声教文明，与此对应，“文物”指礼乐制度，与现代文物概念不尽相同。但到了后来，唐颜师古《等慈寺碑》：“即倾许之人徒，收亡隋之文物。”杜牧《题宣州开元寺》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其“文物”的含义均指古物，与现代文物概念就较为接近了。作为“故宫学”的文物学，其研究领域应主要是院藏的各类文物。此外，支撑院藏文物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也应纳入学科进行介绍。

（一）院藏文物

两岸故宫院藏文物种类繁多，且都非常丰富。北京故宫包括文献在内的院藏文物总数超过 150 万件，台北故宫包括文献在内的院藏文物据最新统计有将近 68 万件。以下参照《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即所谓“60 卷”）[2]，分五大类、十八小类进行介绍。

1. 书画

书画是两岸故宫的收藏大宗。北京故宫院藏书画总数超过 12 万件（不包括尺牍），台北故宫院藏书画据最新统计有近 1 万件（包括尺牍）。大致可分法书、绘画、碑帖三小类。

（1）法书

北京故宫院藏法书 54927 件，元以前的精品有 310 件。台北故宫院藏法书 3046 件，元以前的精品有 150 余件。

（2）绘画

北京故宫院藏绘画 43202 件（不包括壁画、版画、画像石、画像砖），元以前的精品近 420 件。台北故宫院藏绘画 5287 件，元以前的精品有 570 余件。

（3）碑帖

1　顾铁符：《夕阳刍稿》，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　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 — 2008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34-335　11-2-14 下午5:23

北京故宫院藏碑帖 25464 件（包括墓志拓本）。台北故宫院藏碑帖 1369 件（其中法帖 474 件，拓本 895 件）。

北京故宫院藏书画精品，除了号称镇宫之宝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外，还有东晋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顾恺之的《列女图》、《洛神赋图》，隋人书《出师颂》，展子虔的《游春图》，唐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苏轼的《归去来辞》，黄庭坚的《自书松风阁诗》，米芾的《蜀素帖》，以及元初三大书家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的作品。台北故宫院藏书画精品，除了号称镇宫之宝的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外，还有王羲之的《远宦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唐孙过庭的《书谱》，阎立本的《王会图》，唐玄宗的《鹡鸰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刘中使帖》，僧怀素的《自叙帖》，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韩干的《牧马图》，后梁荆浩的《匡庐图》，南唐顾德谦的《梁元帝番客入朝图》，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苏轼的《寒食帖》，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等。这些书画精品，包括其他一些名家作品，基本都经过了徐邦达[1]、刘九庵[2]、马子云[3]等书画大家的鉴定。

2. 器物

器物是两岸故宫的重点收藏。北京故宫院藏器物将近 45000 件，台北故宫院藏器物据最新统计有 13000 件。大致可分石刻、雕塑、铜器三小类。

（1）石刻

北京故宫院藏石刻 5966 件，包括石鼓、石经（幢）、墓志、塔铭、造像（座）、黄肠石、石棺、井栏等。属于精品的有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 年）《孚他君石柱》，东汉时期的《朝侯小子碑》、《汉池阳令张君碑》，三国曹魏时期的《曹真碑》（残断）、《三体石经》残石，西晋时期的《当利里社碑》等。台北故宫未见院藏石刻文物。

（2）雕塑

北京故宫院藏雕塑 9738 件，包括佛教造像、陶俑、画像石、画像砖、石像生、工艺雕塑、建筑雕塑等。属于精品的有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白石造像，如隋开皇五年（585 年）、开皇十一年（591 年）的弥勒三尊立像。还有广东韶关南华寺北宋时期的木雕罗汉像，以及战国至明清时期的陶俑等。台北故宫未见院藏雕塑文物。

（3）铜器

北京故宫院藏铜器包括青铜器 10850 件，铜镜 4087 件，古金属 425 件，仿古彝 893 件，货币 12914 件。其中先秦铜器约 1 万件左右，有铭文的 1600 馀件。除了号称镇宫之宝的酗亚方樽外，属于精品的还有商代后期的三羊尊、兽面纹甗，西周早期的伯盂，西周中期的师趛鬲、追簋，商周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前期的燕乐渔猎攻战图壶等[4]。台北故宫院藏铜器近 13000 件（包括铜器 6044 件、钱币 6953 件），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4300 多件，有铭文的 500 件。除了号称镇宫之宝的毛公鼎外，属于精品的还有商代中期

1 徐邦达：《徐邦达集》全 16 册，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陆续出版。
2 刘九庵：《刘九庵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刘九庵书画鉴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 年。
3 马子云：《碑帖鉴定浅说》，紫禁城出版社，1986 年；《碑帖鉴定》（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4 故宫博物院（刘雨、丁孟）：《故宫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

的蟠龙纹盘、兽面纹觚，西周早期的散氏盘、宗周钟，战国时期的牺尊，以及北魏太和元年（477 年）的《青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等。

3. 宫廷文物

宫廷文物是北京故宫的收藏大宗，台北故宫虽然也有但不太多。北京故宫院藏宫廷文物将近 2 万 5 千件，台北故宫院藏宫廷文物据最新统计有 3000 馀件。大致可分织绣、漆器、文具、家具四小类。

（1）织绣

北京故宫院藏织绣 139592 件，包括服饰 124424 件，佩饰 6034 件，戏衣 8326 件，地毯 808 件。台北故宫院藏织绣文物据最新统计仅有 444 件，包括织品 138 件，丝绣 306 件。其中以北京故宫院藏南宋沈子蕃缂丝《梅鹊图》最为珍贵。还有明崇祯年间顾寿潜之妻韩希孟的《顾绣宋元名迹册》。“顾绣”原出上海，素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价值高而闻名于世。此册系以宋、元名画为蓝本，摹临刺绣，共有八幅，其中《米画山水图》仿宋米芾笔法，《女后图》摹宋画风格，《洗马图》仿元赵孟頫风格，《花溪渔隐图》仿元王蒙笔法，还有《补衮图》、《瑞鹿图》、《松鼠葡萄图》、《扁豆蜻蜓图》等，每幅均有董其昌题词，堪称美轮美奂，精巧无伦[1]。

（2）漆器

北京故宫院藏漆器 17707 件，以元明清三代传世雕漆作品为主，兼有少量早期墓葬出土物。属于精品的有 325 件，时代最早的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彩绘漆透雕座屏、彩绘漆鹿角镇墓兽、彩绘漆几何纹方耳杯、彩绘漆涡纹方耳杯，但以元代张成造款雕漆云纹盘和张敏德造款剔红赏花图圆盒最为珍贵[2]。台北故宫院藏漆器 707 件，也以雕漆为最多，有 400 馀件，多为明清两代官方所造，属于精品的有明永乐雕漆双龙戏珠长方盘，明宣德雕漆双凤牡丹、八瓣盘，明嘉靖雕漆云龙圆盘，清乾隆雕漆云龙方盒等。还有一组鎏金漆器，也很珍贵。

（3）文具

北京故宫院藏各类古代文具多达 8 万馀件，包括墨 5 万馀件，砚约 4 千件，毛笔 4 千馀件，纸绢 1 万馀件，图章料约 1 千件等。其中，墨的时代上起明朝宣德，下至清末民初，不少为明清制墨名家的作品[3]；砚主要为歙、端名砚，年代在汉代至民国之间，明清制砚名家的作品较多；毛笔少数为清宫旧藏明代作品，多数为清宫为自用而储备的遗存；纸绢除宋代米色藏经纸、黄色写经纸，明代蜡印故笺及竹纸等外，主要为清代制作的宫廷纸绢，包括康熙时曹寅恭进各色粉笺、乾隆时仿明仁殿画金如意纹粉蜡笺等。台北故宫院藏文具 2389 件，其中没有纸张；砚有宋米芾“蠹虫瓜瓞”砚以及清宫制作的松花砚等；笔、墨均为明清两代遗物，如明嘉靖彩漆龙管笔、清嘉庆御题万春集庆五色墨等。

（4）家具

北京故宫院藏明清家具 5300 馀件，年代最早的为明朝宣德年间，最晚为清末民初，尤以乾隆时期为多。包括床榻、椅凳、桌案、箱柜、屏联和台架等品种，材质主要为紫檀木、花梨木（包括黄花梨木）、酸枝木、铁梨木、乌木、鸡翅木等名贵木材，另有一定数量的漆家具和西洋家具，其中 70 件被定为国家一级藏品[4]。

1 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明露香园顾绣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年。
2 李久芳主编：《故宫博物院藏雕漆》，文物出版社，1985 年。陈丽华：《故宫藏明清雕漆》，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3 周绍良：《清代名墨谈丛》，文物出版社，1982 年。
4 胡德生：《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家具大观》，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36-337 11-2-14 下午5:23

台北故宫院藏明清家具不足 50 件，都是近 20 年从香港收购所得。最有代表性的是原北京恭亲王府旧藏的一套家具，共计 30 馀件，时代应为乾隆晚期，估计为和珅时旧物。

4. 工艺文物

工艺文物也是北京故宫的收藏大宗，台北故宫的收藏也较丰富。北京故宫院藏工艺文物 387129 件，台北故宫院藏工艺文物据最新统计有 39696 件。大致可分陶瓷、玉器、珐琅器、金银器四小类。

（1）陶瓷

北京故宫院藏陶瓷 349196 件，包括陶 1896 件，瓷 347265。从新石器的彩陶、黑陶、红陶，到商周的白陶、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汉魏六朝的青瓷、黑瓷，唐代南青北白的代表，宋代的各大名窑瓷器，元代的枢府釉和青花、釉里红器，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直到民国时期景德镇烧造的居仁堂款的瓷器和湖南醴陵生产的瓷器，各个时期都有。还有 200 多个古窑址的 36000 馀件标本，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所鲜见。属于精品的陶瓷很多，清代前期的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为其中代表。这些陶瓷精品，基本都经过了孙瀛洲[1]、耿宝昌[2]等陶瓷大家的鉴定。台北故宫院藏陶瓷据最新统计有 25423 件，从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基本上也是各个时期都有。其中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瓷器，明代官窑瓷器与清代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及珐琅彩瓷器属于精品。

（2）玉器

北京故宫院藏玉器 28461 件，虽然清宫旧藏数量较大，但考古新获数量也不少。最早为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玉器。商代玉器有近 1000 件，多为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入藏，主要属于殷墟流散文物。春秋战国玉器被评为一级文物者有近 200 件，可见品质之珍贵。汉代玉器数量很多，且精品不少，包括玉酒樽及玉马、玉羊、玉鸠、玉辟邪等。往下也是代有珍品。宋代青玉云龙纹炉为其中代表[3]。台北故宫院藏玉器 11763 件，其中属于南迁的玉器有 3894 件，其馀都是到台湾后征集的，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勾云形佩，良渚文化的玉琮、玉刀等。还有同属新石器时代的鹰纹圭和人面纹圭。往下属于精品的还有商代的鸟纹佩，汉代的玉辟邪，唐玄宗、宋真宗的玉册，清乾隆朝的玉鸠杖首及清代的肉形石、翠玉白菜等。

（3）珐琅器

北京故宫院藏珐琅器 6155 件，年代上起元代，下至清末民初，以掐丝珐琅器和画珐琅器为主。元代掐丝珐琅器属于精品者有兽耳三环尊、三足炉等，还有被称为镇宫之宝的缠枝莲纹象耳炉。明代掐丝珐琅器分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以宣德朝为代表，后阶段以万历朝为代表。清代是掐丝珐琅器工艺蓬勃发展时期，其中以乾隆朝为最优，不仅数量庞大，且精品、极品超过前后任何朝代。画珐琅器为清代新创，属于舶来新型工艺品种，以康、雍、乾三朝为最盛，不仅精致优美，且各具特色。北京故宫院藏珐琅器中，金属胎珐琅器尤为令人宝贵[4]。台北故宫院藏珐琅器 2510 件，年代主要为明清，其中以掐丝珐琅器为主，属于精品者有明宣德掐丝珐琅龙耳洗、景泰掐丝珐琅熏炉，清康熙画珐琅彩绘牡丹方壶、雍正画珐琅龙耳瓶、乾隆掐丝珐琅大

1 孙瀛洲：《元明清瓷器的鉴定》，《文物》1965 年第 11 期，11 — 20 页；《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续），《文物》1966 年第 3 期，48 — 58 页。
2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1993 年。
3 张广文：《故宫藏玉》，紫禁城出版社，1996 年。
4 陈丽华：《故宫藏金属胎珐琅器》，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方觚等。

（4）金银器

北京故宫院藏金银器 3317 件，其中金器 2419 件，银器 898 件，多为清代乾隆至宣统帝后御用之物，如金錾花嵌珠杯、盘，赤金錾花八宝餐具，银带盖大火锅，金累丝万年如意，金镶红蓝宝石戒指，金镶九龙戏珠镯，以及金鹤香熏等。不少还镌刻“万寿无疆”一类文字。其中最为珍贵者是被称为镇宫之宝的乾隆款金瓯永固杯。台北故宫未见院藏金银器。

5. 其它文物

其它文物两岸故宫院藏都不少，由于难以具体统计，数目经常有变化。大致可分宗教文物、外国文物、钟表仪器、杂类文物四小类。

（1）宗教文物

北京故宫院藏宗教文物几年前统计有 41125 件，包括祭法器 7126 件，陈设品 25350 件，佛像 8647 件，主要分属佛、道、萨满三教。萨满教文物最少，道教文物也不多，佛教文物较多，其中又以藏传佛教文物为最多。藏传佛教文物原存清宫多处藏传佛教佛堂，现存较为完好的原状佛堂就有雨花阁、宝华殿、宝相楼、吉云楼、佛日楼、梵华楼等 20 多处，不仅建筑完整，而且室内匾联、供案、神佛造像、佛塔、供器、法器、唐卡、壁画等皆维持清代原样，甚至摆放位置都未变[1]。台北故宫收藏的宗教文物以佛教为主，其中藏传佛教法器约 200 馀件，系旧存故宫慈宁宫花园者，包括法衣、供具、乐器、祈福法器、降魔法器等。还有印度教、耆那教等文物。

（2）外国文物

北京故宫院藏外国文物 4903 件，部分为国家间的礼品，部分为当时藩属国的贡品，部分为从西洋采买品。礼品中有日本的绘画、陶瓷、雕塑、织物、漆器、家具、珐琅、书籍等，贡品中有琉球王国进贡的东洋漆盔甲等，英使马噶尔尼向乾隆皇帝进献的火枪与腰刀等。还有奥地利、俄罗斯等国的少量文物。

（3）钟表仪器

北京故宫院藏钟表仪器 2629 件，包括度量衡 317 件，钟表 1550 件，仪器 762 件。钟表均为机械钟表，部分为舶来品，也有仿制品。仪器分天文仪器、地理仪器、数学仪器三种，天文仪器主要有天体仪、浑仪、日月星晷仪，地理仪器主要有象限仪、全圆仪、测角仪器，数学仪器主要有各类尺子、几何模型。台北故宫未见院藏钟表仪器。

（4）杂类文物

北京故宫院藏杂类文物品种繁多，主要包括帝后玺册 4941 件，国际礼品 3132 件，国内礼品 581 件，鼻烟壶 2000 馀件，成扇 5000 件等。台北故宫院藏杂类文物情况相同，主要包括鼻烟壶 1000 馀件，成扇 1651 件，竹木牙角雕刻 652 件，杂项 12347 件等。

1 故宫博物院：《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38-339 11-2-14 下午5:23

（二）流散文物

据郑欣淼先生《故宫学述略》记载，清宫文物的大规模流散，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 1860 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野蛮劫掠；第二次是 1900 年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的抢劫；第三次是清逊帝溥仪“小朝廷”时期对宫廷文物的盗运。杨仁恺先生曾用三十多年时间主要追踪第三次溥仪盗运清宫文物的下落，所著《国宝沉浮录》言之甚详[1]。这里兼对前两次清宫流散文物下落作一简单介绍。

1. 国内博物馆收藏

清宫旧藏文物流散于国内者不少，国内各大小博物馆多有收藏。这里主要介绍南京、上海、吉林、辽宁等几家博物院馆的收藏。

（1）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收藏清宫流散文物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前古物陈列所移交的清热河、奉天行宫的宫廷文物，内有大宗瓷器、各类陈设品及工艺品。此外，南京博物院还收藏了一些清宫流散书画，譬如宋徽宗的《鹳鹆图》等[2]。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北宋摹本梁元帝《职贡图》（据说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据徐邦达先生考证，该图于清乾隆以后一直收藏在皇家内府，民国十四年（1925 年）被溥仪携至长春，1945 年伪满洲国覆灭，才流散民间，并为南京博物院收藏[3]。

（2）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收藏清宫流散文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青铜器，非常精美。一类是书画，都是精品。譬如东晋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北宋米芾的《多景楼诗册》，宋徽宗的《柳鸦芦雁图》，宋高宗的《嵇康养生论卷》，元张渥《雪夜访戴图》，王蒙《青卞隐居图》，明赵原《合溪草堂图》，唐寅《枯槎鹳鹆图》，文伯仁《清溪渔隐图》等[4]。明仇英的《剑阁图》和《赤壁图》也有可能为清宫流散绘画。

（3）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馆收藏清宫流散文物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因为吉林长春原是伪满洲国“皇宫”所在地，1951 年筹建吉林省博物馆，即以原伪满洲国“皇宫”东院的“同德殿”、“嘉乐殿”、“御花园”为主要馆舍。吉林省博物馆成立数十年来，特别注重对原藏长春“皇宫”的清宫流散文物的寻访和搜集。现藏清宫流散文物除了玉器等外，主要是书画，有数十件之多，如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金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元何澄的《归庄图》，张渥的《九歌图》，明仇英的《松溪论画图》，董其昌的《昼锦堂图并书记》，清丁观鹏的《法界源流图》等，都是其中的精品。

（4）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清宫流散文物最为丰富，都是溥仪带到东北的缂丝绣品、玉器精品和书画名品。1957 年曾将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公麟摹韦偃的《牧放图》，南宋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尽管如此，现藏清宫流散书画总数仍达 146 件（组），其中晋唐宋元书画就达 60 至 70 件之多，包括唐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北宋摹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即之的《行楷书杜诗》，宋徽宗的《瑞鹤图》、《行书蔡行勅》、《草书千字文》等[1]。值得一提的是，唐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现存两个摹本，台北故宫收藏的为南宋摹本，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为北宋摹本，更为珍贵。

2. 国外博物馆收藏

清宫旧藏文物流散于国外者更多，世界各大小博物馆多有收藏。这里主要介绍英国、法国、美国等几家博物馆的收藏。

（1）英国大英博物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号称收藏中国流散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目前收藏的中国流散文物多达 2 万 3 千件，长期陈列的就有约 2000 件。其中，属于清宫流散文物者，除了大量的清宫陶瓷，还有几件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的龙袍，以及嘉庆元年“皇极殿千叟宴太上皇御赐养老”银牌等。最著名的自然就是当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英军大尉基勇从圆明园盗走的唐摹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该图传世有两个摹本，一个是现藏北京故宫的北宋李公麟的摹本，一个即是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这件唐代摹本。大英博物馆将该图作为镇馆之宝，其价值可想而知。

（2）法国枫丹白露宫

法国枫丹白露宫是法国最大的王宫之一，内设中国馆，收藏文物 1000 馀件，全部为圆明园流散文物。当年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梵香楼有两座金佛塔，其中一座现藏北京故宫，另一座即藏枫丹白露宫。此外，还有三幅巨大的乾隆年间绣有藏传佛教内容的缂丝绣品，以及各种珠宝、玉器、青铜器等。

（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清宫流散文物据说有 17 件。其中一件为一柄用名贵白玉雕成的康熙玉如意。还有一幅元赵孟頫、赵雍、赵麟三世《人马图》合卷，盖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及“三希堂精鉴玺”等印鉴，无疑为清宫流散文物。

（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博物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中国书法作品最为宏富和珍贵，号称“海外第一家”，其中不少为清宫流散书法作品。譬如最负盛名的王羲之《行穰帖》，有“内府秘宝”题签，还有乾隆御题，并盖有“太上皇帝之宝”印鉴，无疑为清宫流散书法作品。此外，该馆收藏的著名的黄庭坚《赠张大同书》、米芾《三札》（为《逃暑》、《弊邑》、《留简》三帖，与北京故宫收藏的米芾《三札》为《长至》、《韩马》、《新恩》三帖不同），也应为清宫流散书法作品。

3. 国内外私人收藏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粗略统计，中国流散于国外的文物多达 164 万件，被世界 47 家博物馆收藏。而流散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私人手中的中国文物大概是这个数字的 10 倍甚至 100 倍。而随着中国文物

1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增订本），辽海出版社，1999 年。
2　徐湖平主编：《南京博物院藏（庞莱臣旧藏・庞增和捐献）古代绘画选》，文物出版社，2006 年。
3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37 — 39 页。
4　上海博物馆：《中国博物馆藏画：上海博物馆藏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年。

1　辽宁省博物馆主编：《清宫散佚国宝特集》，中华书局，2004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40-341　11-2-14 下午5:23

拍卖价格的不断攀高，这些流散文物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加剧流散。以书画为例。譬如：2002 年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在拍卖会上以 2530 万元人民币成交尚属常态，2004 年元鲜于枢的《草书韩愈石鼓歌》在拍卖会上以 4620 万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书法作品拍卖世界纪录，2007 年明仇英的另一幅《赤壁图》在拍卖会上以 7952 万元人民币成交再创新高，而 2008 年宋徽宗的《临唐怀素圣母帖》在拍卖会上以 1.28 亿港元成交爆出天价，2010 年北宋黄庭坚的《砥柱铭》在拍卖会上以 3.9 亿元人民币成交爆出更大的天价。这些私人收藏的拍卖品中，不少都是清宫流散文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人收藏的所谓清宫流散文物，有的存在真伪问题。人所熟知，北京故宫收藏的唐韩滉的《五牛图》，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从香港购买回来的。该图曾经专家鉴定，属于真品没有问题。但日本京都大原美术馆也收藏了一件绢本淡设色的唐韩滉《五牛图》，据说也是当年八国联军从清宫盗走的。日本绘画史学家铃木敬、米泽嘉圃等认为大原藏图为真，北京故宫藏图可能为伪，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2002 年 12 月，上海博物馆举办“千年遗珍国际学术研讨会”，蔡星仪先生在会上对此谬说进行了反驳，指出大原藏图为伪，北京故宫藏图为真[1]。这是可以作为定论的。

关于清宫流散文物，从“故宫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应该如何处理，本文拟在下面谈文献学时再作评述。

（三）支撑组织及单位

北京故宫院藏书画和陶瓷均蔚为大宗，故设有专门支撑书画研究和陶瓷研究的组织及单位，这就是古书画研究中心和古陶瓷研究中心。

1. 古书画研究中心

古书画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10 日，挂靠北京故宫古书画部。中心成立之前，北京故宫就一直非常重视对院藏古书画的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更是如此。定期举办展览、会议和举行相关学术讲座，为中心重要业务之一。即以 2009 年下半年为例。11 月 16 至 18 日，中心推出“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小蓬莱阁汉魏碑刻特展”，并于其间（17 日）在院外召开了“黄易与金石学”研讨会。又于 8 月 10 日、11 月 3 日、11 月 27 日、12 月 21 日，举行了四场学术讲座，由北京故宫研究馆员、资深古书画研究专家王连起、杨新、聂崇正、肖燕翼四位先生分别就历代兰亭、书画研究、为君难（雍正展）、伪画鉴定等问题进行主讲。2010 年 1 月 8 日，还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先生举行了题为“百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演变”的学术讲座。

2. 古陶瓷研究中心

古陶瓷研究中心也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10 日，挂靠北京故宫古器物部。中心成立之前，北京故宫也一直非常重视对院藏古陶瓷的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仍是如此。定期举办展览、会议和举行相关学术讲座，也为中心重要业务之一。即以 2009 年为例。3 月 25 日，中心代表北京故宫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院内举办了“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10 月 30 日，还邀请福建博物馆研究馆员、福建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粟建安先生举行了题为“中国古代贸易陶瓷——窑址、沉船考古新发现”的学术讲座。

1 蔡星仪：《两卷〈五牛图〉考辩》，《中国书画》2007 年第 9 期，58 — 66 页。

四 文献学

文献学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文献”作为一个专门词汇，始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郑玄注：“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意谓好的典籍。从事“故宫学”各子学科研究，没有好的典籍确实不行。作为“故宫学”的文献学，其研究领域应主要是院藏的各类文献。

（一）院藏文献

两岸故宫院藏文献种类繁多，也都非常丰富。以古籍为例。北京故宫院藏古籍 37 万册，其中善本特藏 20 万册，普通古籍 17 万册，另有书版特藏 23 万块，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有 2600 馀种、10 万馀册[1]，2008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 61 部（包括碑帖），2009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 67 部（也包括碑帖）；台北故宫院藏古籍约 60 万册，包括善本古籍近 20 万册，清宫档案近 40 万件册，满、蒙、藏文字文献 11501 件册。这里分三大类、六中类、十二小类进行介绍。

1. 传世文献

传世文献指在世间流传的文献，又称地上文献。两岸故宫的传世文献，大致都可分为汉文刻本文献、汉文抄本文献及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三中类。

（1）汉文刻本文献

汉文刻本文献指通过刻印公布、流传的汉文文献。两岸故宫的汉文刻本文献大致都可分为四部书与大藏经二小类。

〈1〉四部书

四部书指经、史、子、集四部图书，这是隋代以前图书的传统分类，唐代以后才改四部为四库。北京故宫原藏四部书不少，部分于 1949 年运台入藏台北故宫，部分于 1959 年划拨国家图书馆，尽管如此，现在仍有 37 万册。台北故宫所藏四部书近 20 万册，多为南迁图书之精品，包括原清宫内阁大库藏书、“天禄琳琅”藏书、杨守敬“观海堂”藏书等，其中有宋版书约 200 部、2452 册；元版书 304 部、3667 册，明代善本也有不少。大型类书最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三部。大型丛书最著名的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以及《宛委别藏》正、续、三编等。

〈2〉大藏经

大藏经原称一切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北京故宫藏大藏经种类很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除外，最著名的为《永乐北藏》和《嘉兴藏》。这二部藏经：《永乐北藏》原有正、续 6771 卷，《嘉兴藏》原有正、续 12600 馀卷。但传世均无全本。北京故宫《永乐北藏》存 6732 卷，《嘉兴藏》存 10888 卷，在传世的《永乐北藏》和《嘉兴藏》中，保存最为完好。因而在 2008 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均予收录。

1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998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42-343 11-2-14 下午5:23

2000 — 2004 年北京线装书局重印《永乐北藏》，即以北京故宫藏本为底本[1]。2002 年，在有关方面主持下，民族出版社启动了属于“国家‘十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的“《嘉兴藏》重辑出版工程”，也是根据故宫藏《嘉兴藏》目录进行的。台北故宫也有当年运台的善本佛经 13 箱，大藏经 132 箱。

（2）汉文抄本文献

汉文抄本文献指通过抄写保存、流传的汉文文献。北京故宫的汉文抄本文献大致可分古籍与尺牍二类。台北故宫属于汉文抄本的古籍和尺牍较少。

〈1〉古籍

北京故宫藏有汉文抄本古籍，包括四部书和大藏经，数量不少。最早的当属唐贞观廿二年（648 年）十二月十日国诠写《善见律》和唐王仁煦撰、长孙讷言注、裴务齐正字的《刊谬补缺切韵》。明清汉文抄本古籍最多。其中，明代汉文抄本古籍既有明代遗留的，也有清代采集进献的，质量一般较精，如《太乙集成》、《圣政杂录》、《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及严嵩《钤山堂集》、钱正春《红豆村杂录》等。清代抄本古籍包括呈请皇帝御览之书、大臣采集进献之书、内府未曾发刻之书（如起居注、本纪、玉牒、实录等）、修书各馆工作之书（如稿本、修改本、清本、呈览本、付刻底本等）等。台北故宫也有当年运台的起居注 50 箱，实录 2 箱。还有一件唐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可能也藏在台北故宫。

〈2〉尺牍

尺牍指书信。1949 年以来，北京故宫收进大量尺牍，加上旧藏的尺牍，总数超过 4 万件。其中，元代以前的尺牍都已归入法书、碑帖类。最早的尺牍，当属已经归入法书、碑帖类的镇宫之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还有排名“三希”之二、之三的东晋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明代尺牍有 1 万馀件，清代尺牍有 3 万馀件，近现代尺牍有 2550 馀件，其中不少为名人、名臣的作品。虽然数量上与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尺牍多达 10 万馀件还难以相比，但质量上与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尺牍可以说各有特色。台北故宫最早的尺牍，当属排名“三希”之一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此外，还有一些明清尺牍，数量不多，其中明人尺牍有 887 开。绝大部分尺牍与纯书法作品的法书、碑帖不同，涉及到具体的人、时、地、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2]。

（3）少数民族文字文献

两岸故宫都藏有不少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北京故宫有近 2000 种，近 3 万册，台北故宫有 11501 册，既有刻本，也有抄本，既有四部书，也有大藏经。清廷编纂的《实录》均有满、蒙、汉三种文字抄本；《圣训》等书则有满、汉两种文字抄本。其它如《四书》、《五经》、史传、方略、政书、历书、诗文、工具书及大藏经等，都同时刊行汉、满或蒙、藏文本。除单语种刻本或抄本外，还有很多满汉、蒙汉、满蒙汉或多种文字合璧的写本或刻本。如《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88 卷，清章嘉呼图克图译校，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刻满、汉、蒙、藏文四体合璧本，经折装，正文半页 8 行，满、汉、蒙、藏文各两行，每行字数不均，十分讲究。各种民族文字的四部书和大藏经，是研究各民族语言学、翻译学的珍贵资料。

1 《永乐北藏》整理委员会：《永乐北藏》，线装书局，2000 — 2004 年。

2 张鲁泉、傅红展：《故宫藏明清名人书札墨迹选》，荣宝斋出版社，1993 年。

此外，还有清代四译馆于乾隆十五年（1750 年）编定的《西番译语》九种，记载的是藏语安多方言的牧区语、农区语，藏语康方言的白马语、嘉绒语，以及尔苏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等。北京故宫、北大图书馆各藏有一种抄本，国家图书馆藏有九种晒蓝本，互相比勘，对研究清代藏语方言极有价值。

2. 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指通过考古等方法发掘出来的文献，又称地下文献。北京故宫的出土文献，大致可分甲骨文献、金石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献三中类。台北故宫也有大量的甲骨文献和金石文献。

（1）甲骨文献

甲骨文献指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文字材料，均为 19 世纪末以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据统计，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有近 16 万片，散藏于世界各地。台北故宫藏甲骨 2 万 5 千馀片，数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 35651 片。北京故宫藏甲骨主要为加拿大人明义士及马衡、罗振玉、于省吾等旧藏，已经登记在册的约有 4 千片，未登记在册的据说还有不少，数量排在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北京故宫藏品少部分曾经整理发表，并为《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收录[1]，大部分还有待整理。

（2）金石文献

金石文献大致可分金文文献、石刻文献和其他三小类。北京故宫收藏很多，台北故宫收藏也不少。

〈1〉金文

金文主要指在青铜器上铭铸的文字。北京故宫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约有 1 万件左右，小部分为清宫旧藏，大部分为后来搜购、私人捐献和考古新获，其中 1600 馀件有铭文。还有少量铜器拓本。台北故宫藏商周（同前）青铜器 4300 馀件左右，大致均为清宫旧藏，其中 500 件左右有铭文。譬如著名的“毛公鼎”，内铸铭文 32 行，500 字；还有著名的“散氏盘”，内铸铭文 357 字。两岸故宫藏青铜器，部分为《殷周金文集成》、《故宫青铜器》等书收录[2]。

〈2〉石刻

石刻主要指在石头上铭刻的文字。北京故宫的石刻，情况较为复杂。清宫旧藏只占小部分，大部分都是 1949 年后陆续收藏的。原石不多，高昌墓砖（另见下文）除外，包括石鼓、石经、石碑、墓志、塔铭、造像等，大约有近千件。此外都是拓本和印本，统称为“碑帖”，共有将近 2 万 6 千件左右。虽然数量上与国家图书馆藏“碑帖”多达 4 万馀件还难以相比，但质量上明显较国家图书馆藏“碑帖”为优。其中，拓本主要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碑志，属于石刻；印本主要都是纯书法作品，属于法帖。台北故宫有法帖 474 件，法书 3046 件，拓本 895 件，基本都是南迁的清宫旧藏，其中不少属于石刻。

〈3〉其他

两岸故宫都藏有大量的历代铜镜及金石玺印，历代铜镜多有铭文，金石印玺更是均有铭文，这些也都应算作出土文献。

（3）敦煌吐鲁番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83 年；《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 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 年；故宫博物院（刘雨、丁孟）：《故宫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44-345 11-2-14 下午5:23

敦煌吐鲁番文献主要指 20 世纪初以来敦煌莫高窟和吐鲁番古代墓葬及遗址出土的文献。北京故宫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来源大致有三：一是调拨，一是收购，一是捐献。大致可分古籍、文书、写经、墓砖、其它五小类。

〈1〉古籍

北京故宫藏敦煌吐鲁番古籍不多。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一件佚名道教类书。还有一件敦煌土地庙发现的《诗经注》残卷，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中的《土地庙遗书》词条说："1951 年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以后，转归故宫博物院保管。"但我们至今尚未找到。是否藏于北京故宫，还有待调查与研究[1]。

〈2〉文书

北京故宫藏敦煌吐鲁番文书也不多，主要有书信、酒账[2]、财产分配帐、斋愿文、社司转帖等。还有一件定名为《唐人书黄巢起义记残片》的文书，上记："乾符岁在甲午（874 年）七月，黄巢于淮北起称帝，以尚让为承相，天下沸腾，改元广明元年岁在庚子（880 年）矣。"颇有影响，被定为一级品[3]。

〈3〉写经

北京故宫藏敦煌吐鲁番佛教写经有将近 100 件，小部分为北凉、北魏、北周、隋朝写经，都已归入法书、碑帖类，大部分为唐宋写经，不久前才刚进行过整理与编目[4]。唐宋写经中，也有不少精品。譬如：一件麴氏王国延寿十六年（639 年）写经，与大英图书馆藏 S.3888 号写经均为同年同月同一组人所写[5]。还有一件唐咸通十年（869 年）写经，与加拿大大维多利亚美术馆藏 1983.065.004.001-.003 号写经也均为同年同一人所写[6]。这对深入研究这些写经的供养人及其相关背景有着重要意义。

〈4〉墓砖

北京故宫藏吐鲁番出土墓砖，习惯上都称为"高昌墓砖"，均为黄文弼先生 1928 年和 1930 年二次到吐鲁番考古发掘所获。黄文弼先生当年一共获得 124 方高昌墓砖，仅 2 方藏于国家博物馆，另 122 方均藏于北京故宫。这批高昌墓砖虽然绝大部分都已公布图版，但仍有一小部分至今尚未公布图版。这批高昌墓砖对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高昌国以及唐西州时期的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7]。

〈5〉其他

此外，还有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物，虽然与文献没有关系，但作为一个整体，仍不得不提。这就是北京故宫还藏有不少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绘画、雕塑和纺织品。绘画有敦煌佛画 10 件，吐鲁番伏羲女娲图 8 件（还有一件残片）。雕塑有敦煌菩萨、天王、罗汉泥塑头像三件，是 1955 至 1956 年在故宫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后，经文物局同意留下来的[1]。吐鲁番纺织品约有 9 件。

1 王素：《敦煌土地庙发现的《诗经注》残卷——读 < 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 > 札记之一》，"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国家图书馆，2010 年 6 月 16 日至 17 日。

2 施安昌：《故宫藏有关鞑靼的敦煌酒账初探》，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3 期，收入同作者《善本碑帖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338 — 342 页。

3 杨新：《唐人书黄巢起义记事墨迹》，原载《文物》1978 年第 5 期，收入同作者《杨新美术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4 年，86 — 93 页。

4 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173 — 182 页；《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提要》（写经、文书类），《故宫学刊》第 3 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561 — 581 页。

5 王素：《故宫博物院藏麴氏王国延寿十六年写经》，《吐鲁番学研究》2007 年第 1 期（半年刊），48 — 50 页。

6 王素：《加拿大维多利亚美术馆藏敦煌写经与佛画》，"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杭州：浙江大学，2010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

7 黄文弼：《高昌砖集》（增订本），考古学特刊第二号，中国科学院，1951 年。

3. 明清档案

北京故宫虽于 1980 年将院藏 800 馀万件明清档案再次划归国家档案馆，正式建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院内仍有名为文献类的清宫档案，包括舆图、内务府陈设档、"样式雷"建筑图档、清中晚期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清宫旧照片、清宫书版等，数量不少。台北故宫也有当年南迁的清宫旧档，共近 40 万件册，大致分宫中档案、军机处档案、内阁档案、史馆档案、舆图五类。由于这些档案还有待进一步整理，这里不多涉及[2]。

（二）流散文献

清宫文献与前述清宫文物相同，也主要是因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之役和清逊帝溥仪"小朝廷"的盗运而流散的。但文献与文物不同，研究价值虽大，欣赏价值却小，进入拍卖市场的不多，收藏较为稳定。这里仅分两大类进行介绍。

1. 国内图书馆、档案馆收藏

清宫旧藏文献流散于国内者应该不少，但多收藏于国内各图书馆和档案馆，情况并不十分明朗。现知收藏最多的为大连图书馆。该馆收藏清代内务府档案 2000 馀件，分满文和满、汉合璧两种本子，其中满文 800 馀件，满文残档 500 馀件，满、汉合璧 1100 件，上盖"总管内务府"朱文大方印，经专家鉴定均为清代宫廷内阁大库档案流散出去的[3]。

2. 国外图书馆、档案馆收藏

清宫旧藏文献流散于国外者应该更多，也多收藏于世界各图书馆和档案馆，情况较为明朗。一部分是各图书馆自己购买的。如耶鲁大学图书馆从中国购买了不少清廷文件的影印本。一部分是清廷或皇帝本人赠送的。如同治八年（1869 年），清廷向美国国会图书馆赠送书籍 10 种、933 册；清廷还向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赠送过《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就是英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档案馆收藏的溥仪赐给其师傅庄士敦的清代十一朝《实录》。一部分来历不明则应是前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之役流散的。如英国大英图书馆所属印度事务部档案馆收藏的明《永乐大典》和清朝《实录》、《圣训》等；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光绪皇帝二妃——瑾妃、珍妃的日常生活记录；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6 册以及康熙玉玺、慈禧书签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2 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等零本，以及一些满、蒙文字典籍等。

关于清宫流散文物文献，从"故宫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应该如何处理？本文认为：第一，根据 1996 年中国政府签署《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郑重声明中国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

1 参阅：《文物保护："院藏三件唐代泥塑保护修复项目"专家验收会在我院召开》，《故宫人》（总第 278 期）2009 年 4 月 25 日第 2 版；《"院藏三件唐代泥塑保护修复项目"召开专家验收会》，《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09 年第 2 期，17 — 18 页。按：这两篇报导中提到的院藏三件唐代泥塑，即这三件敦煌菩萨、天王、罗汉泥塑头像。

2 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3 大连图书馆：《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选编》（全 2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 2011 年待出。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46-347 11-2-14 下午5:23

索的权利，北京故宫应保留对在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之役中流散的清宫文物文献进行追索的权利。第二，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国内一些单位及个人在国家文物局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对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文献进行调查[1]，北京故宫为了“故宫学”的可持续发展，应加入这个行列，并应仿照现在正在编撰的《故宫文物藏品总目》，以项目形式，组织相关人员，编撰《故宫流散文物文献总目》。

北京故宫既有大量的文献学资源，也不乏专业的文献学人才。譬如沈兼士先生，属于专业文献档案学大家，早在 20 世纪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就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工作，整理清宫遗留历史档案，成为清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他认为：档案于一代政治、学术关系极大，整理档案之目的在于充分便利使用。提出档案分类应不同于图书分类，主张档案分类应按机构、团体分类。在他主持文献馆的工作期间，清宫档案分类都是按机构分类的。曾取北京大学所藏汉文黄册 1900 馀册，重新分类列目，汇编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蔡元培先生为该目作序，称他的整理工作“为阅览便利，有助于史学”。他除了文献档案学，还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2]。可惜的是，北京故宫目前还没有支撑文献学研究的组织及单位，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五　宗教学

宗教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宗教学原属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原始表现形式包括迷信、法术、拜物教、图腾崇拜、万物有灵论等。因此，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宗教学，虽然迟至 20 世纪初才从欧洲引进，但其原始表现形式实际早在远古就已存在了。两岸故宫均藏有大量宗教文物和文献已如前述。作为“故宫学”的宗教学，至少可分历代宫廷宗教信仰、明清宫廷宗教信仰二大研究领域。此外，支撑宫廷宗教研究的组织及单位，也应纳入学科进行介绍。

（一）历代宫廷宗教信仰

唐李商隐《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是西汉文帝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3]。历代宫廷都有相信鬼神，崇拜方术，笃奉宗教之帝王、后妃。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例介绍秦汉、唐宋宫廷宗教信仰情况。

1. 秦汉宫廷的鬼神方术与佛教初传

鬼神之说，自古即有。《史记·五帝本纪》：“明鬼神而敬事之。”《正义》解释：“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人之精气谓之鬼。言明识鬼神而敬事也。”可见最早的“五帝”在他们的宫廷里就敬事鬼神。方术原指某一方面技能，故医卜星相，堪舆谶纬，遁甲风角，最早均属方术。精通方术的人称为方士。秦汉皇帝大都相信鬼神，崇拜方术，交结方士。这时的方术几乎已成神仙之术的专称，方士也几乎已

1 《国家文物局表示鼓励和支持有关机构和学者开展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调查工作》，《中国文物报》2009 年 10 月 30 日第 1 版。

2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 年。

3 据《史记·贾谊列传》记载：西汉文帝时，贾谊遭谗言，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文帝想念，征还，在宣室召见。“上（指文帝）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当时人均跪坐于席上。“前席”指为接近对方而将坐席向对方移动。司马迁本意是说，文帝听贾谊解说鬼神之事着迷，不由自主将坐席向贾谊移动。而李商隐此诗作了发挥。“虚”意为尽、用尽。说文帝以求贤名义将被贬逐的贾谊从长沙征回长安，在宣室召见，将坐席前移到无可再移，却不是问天下苍生，而是问虚幻的鬼神。

成精通神仙之术的人的专称。

（1）秦始皇与鬼神方术

历史上每位有建树的皇帝，当大功告成，别无所求时，就开始贪生怕死起来，秦始皇就是如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前 221 年）统一中国，虽然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实际却是想自己将皇帝永远做下去。他为此迷信鬼神，耽尚方术，广交方士，求不死之药。当时宫廷“方术士甚众”。他曾三次派遣方士出海寻找仙人，求不死之药。第一次就在刚刚统一中国的两年后，也就是二十八年（前 219 年），可见心情之迫切。这一次是方士徐市等先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1]。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此徐市就是徐福。第二次在三十二年（前 215 年）稍早，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卢生也是方士。羡门、高誓均为古仙人之名。第三次在同年稍晚，说“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韩终、侯公、石生也都是方士。第一、三两次派出的方士徐福、韩终、侯公、石生等，都因为没有找到不死之药，而不敢返回。关于他们的最终去向，传说很多，无须多说。仅第二次派出的方士卢生回来了。卢生虽然回来，但心存恐惧，为了转移始皇的注意力，就对始皇大谈“鬼神事”，并奏称在海外获得图书，上面写道：“亡秦者胡也。”导致始皇开始北伐匈奴，修筑长城。尽管如此，卢生还是以始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为由，最终也逃跑了。始皇大怒，抓不到方士，就案问诸生，最后将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始皇为求不死之药，前面导致北伐匈奴，修筑长城，后面导致案问诸生，坑杀儒士，宫廷宗教信仰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2）汉武帝与鬼神方术

西汉取代嬴秦，不但继承了秦王朝的典章制度，也继承了秦宫廷的鬼神方术。整个西汉一代，宫廷都笼罩在鬼神方术之中。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已见前述。但他还比不上他的嫡孙武帝。《史记·孝武本纪》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并与方士李少君、史宽舒等交结。但武帝真正信任的第一个方士是少翁。此少翁正是“以鬼神方见上（指武帝）”。武帝对少翁信之不疑。武帝早年最宠爱王夫人，夫人死，武帝思之。少翁“以方术”让武帝半夜隔着帘帷见到王夫人的形貌。武帝从此更加倚重少翁，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少翁对武帝说：“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遂帮助武帝在宫中大兴改造工程。特别是“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后来因无灵验，武帝将少翁杀了。武帝信任的第二个方士名叫栾大。栾大与少翁师出同门，据说“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曾对武帝大言：“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安期与羡门相同，也为古仙人之名。又引述其师之言：“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武帝大喜，拜大为五利将军，不到数月，佩六将军金印，宠幸可谓一时无两。后来也因无验，武帝又将栾大杀了。武帝信任的第三个方士名叫公孙卿。同书《封禅书》说：“（栾）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揣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可见同行之间竞争之激烈。这就逼着公孙卿需要比栾大更为大胆、更能大言。公

1 《汉书·郊祀志下》说：“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可见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有仙人及不死之药的传说，在战国时期齐、燕的宫廷里就已非常流行，齐、燕诸王也都曾派人出海寻找仙人及不死之药。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48-349
11-2-14 下午5:23

孙卿将武帝骗得整天求仙、候神，封太山、禅梁父，一年四季到处奔波。结果也无灵验。这时武帝连杀公孙卿的兴趣也没有了。后来，《资治通鉴》武帝征和四年（前 89 年）三月条记武帝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这一年是武帝即位第五十二年，也是他死前二年。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3）汉明帝与佛教初传

东汉一代，鬼神方术虽然仍是宫廷的主流信仰，但也在渐渐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鬼神方术，实际解决不了人类的生死问题。甚至包括后来较为成熟的道教在内，他们都舍不得抛弃自身的“臭皮囊”，而希望肉身成圣，羽化登仙。而秦皇、汉武都是前车之鉴，实际上办不到。关于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既是一个哲学范畴问题，更是一个宗教范畴问题[1]。也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正在这时，佛教传来了。关于佛教何时初传中国，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汤用彤先生先从“伯益知有佛”到“刘向叙列仙”列举了十说，然后举出“永平求法”说，加以考证，认为惟有此说才“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2]。此“永平求法”，即指东汉明帝于永平（58 — 75 年）初年梦见佛祖，并遣使西行取经事。其事首见于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人所熟知，无须多说。总之，中国有佛教自此始。佛教初传中国之后，首先当然是在宫廷流行。明帝本人信佛固无疑问。之后，桓帝也在宫中拜佛。《后汉书·桓帝纪》说桓帝在宫中“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同书《襄楷传》载楷于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同时也在上层社会流行。明帝的同父异母弟楚王英也信奉佛教。同书《楚王英传》说：“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 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楚王英也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明帝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均将外来的“浮屠”（或浮图）与本土的“黄老”并列。可以认为，佛教传到中国，得以广泛流行，与宫廷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2. 唐宋宫廷的三教融合与释道之争

佛教传到中国，虽然流行迅速，但也由于种种原因，常有阻力。而土生土长的道教无此问题。譬如佛教在东汉末年就已传到江东，但三国孙吴政权的所有皇帝却都崇信道教。孙吴大帝孙权的年号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会稽王孙亮的年号建兴、五凤、太平，景帝孙休的年号永安，末帝孙皓的年号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几乎都带有道教色彩。从南北朝到唐宋，其间还经过了“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佛教为了在中国生存，很早就加速了自身的中国化。而几乎同时，也出现了三教融合的呼声。北周卫元嵩曾撰《齐三教论》七卷，隋唐之际杨上善曾撰《三教诠衡》十卷。然而，到了唐宋，情况又如何呢？

（1）唐玄宗与道教独尊

唐朝皇帝姓李，与老子同姓，与道教关系自应非同一般。唐初曾追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祖。唐太宗欲东伐高丽，房玄龄谏称：“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可以为证。唐高祖曾于武德七年（624 年）十月亲到终南山拜谒老子庙。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记高祖此次还曾颁布“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的诏令。唐高宗曾于麟德三年（666 年）二月“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可见唐前期的太祖、太宗、高宗都尊崇道教。但他们尊崇道教，加起来也不如玄宗。《旧唐书·方伎·张果传》说：“玄宗初即位，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及闻变化不测而疑之。”可见玄宗开始是不信道教的。玄宗尊崇道教，大概在开元末、天宝初。同书《王玙传》说：“开元末，玄宗方尊道术，靡神不宗。”《新唐书·王玙传》则说：“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据两《唐书》记载：他先是“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将“四子”所著书均改称为“真经”，并以“四子”为考试科目；接着亲自为老子《道德经》作注，并“诏天下家藏其书，贡举人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最为扰民的还是不断追赠老子。天宝元年（742 年）九月刚刚诏令“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准此”，接着又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追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追上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还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由于天下都要照办，官民自然不厌其烦。

（2）唐宪、懿二宗与诏迎佛骨

唐代本属开放包容社会。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应该毫无争议。道教地位崇高，主要限于宫廷和官府。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实际远远超过道教。因此，如何平衡三教，也是当时的重要话题。据两《唐书》记载：武则天曾于永昌元年（689 年）二月“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玄宗亦于开元十六年（728 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难禁中”。德宗也于贞元十二年（796 年）四月“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值得注意的是，讨论三教问题，基本都在宫廷。三教孰优孰劣？讨论有否结果？都可以不管。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那就是玄宗如此尊崇道教，却不能阻止“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如此，这场浩劫及其影响，直到德宗时期仍未结束。德宗死后，顺宗继位仅半年多就退了位，接着宪宗继位。宪宗改弦更张，于元和十四年（819 年）正月诏迎佛骨。《旧唐书·宪宗纪下》说：“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韩愈上《谏迎佛骨表》，结果正如他诗中所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宪宗也于次年正月暴死。过了几代皇帝，到懿宗当政，由于时局艰难，咸通十四年（873 年）三月又诏迎佛骨。《新唐书·李蔚传》记有人提醒懿宗：“昔宪宗尝为此，俄晏驾。”懿宗不听。《旧唐书·懿宗纪》说：“四月八日，（法门寺）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然而仅过三月，懿宗也暴死了。史臣评曰：“佛骨才入于应门，龙輴已泣于苍野，报应无必，斯其验欤。”唐宫廷尊崇佛教，也到此结束。

（3）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

经过唐朝灭亡，五代动乱，到了北宋，虽然北方仍有契丹、西夏为患，但地处中原的国都汴梁却是一片祥和。尤其是在宋徽宗赵佶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一部《东京梦华录》，画尽了也写尽了徽宗时期汴梁的繁华。北宋皇帝本来大都尊崇道教。在徽宗之前，最尊崇道教的是真宗、神宗，这从其庙号一为“真”、一为“神”

1　张岱年曾经指出：古今中外的“终极关怀”有三种类型：（1）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3）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见：《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1 期，95 — 97 页。前一种类型属于宗教范畴，后两种类型属于哲学范畴。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 1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1 — 22 页。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50-351　11-2-14 下午5:23

已可看出。而徽宗一出现，他们顿时都黯然失色。徽宗多才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古今无人能出其右。正因自恃才高，在尊崇道教方面，也不愿落人之后。徽宗于元符三年（1100 年）正月继位，次年就开始大修宫观。政和三年（1113 年）交结道士王老志，犹有节制。政和七年（1117 年）交结道士林灵素，遂欲罢不能。据《宋史·徽宗纪》记载：当年四月，就“讽道箓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虽说“止于教门章疏内用”，但从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金兵大举南下，徽宗逃避责任，禅位于儿子钦宗，还要钦宗尊称自己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来看，这一封号在宫廷是通用的。尤其在他当政期间，道教地位等同国教。他一方面“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一方面“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连制郊祀大礼，也“以方士百人执威仪前引”。更有甚者。据《宋史·选举志三》记载：“政和间，即州、县学别置斋授道徒。……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其业儒而能慕从道教者听。……《内经》、《道德经》置博士，《圣济经》兼讲。道徒升贡，悉如文士。……陈州学生慕从道教，逾月而道徒换籍，殆与儒生相半。”将国家抡才大典，变成了道士选拔大典。而北宋之亡，亦与此有关。

（二）明清宫廷宗教信仰

明清宫廷宗教信仰十分复杂。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经过唐代的开放包容，又经过蒙元帝国的欧亚一体统治，很多西方宗教不仅传入中国，还都在中国本土发展变化。明清两代，中国不但有儒、释、道三教，还有萨满教、喇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五代、宋元以来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明教，由弥勒下生信仰发展而成的白莲教等。这些宗教对明清宫廷的宗教信仰都曾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1. 明宫廷的释道二教

明宫廷涉及宗教虽然较多，前期有喇嘛教，后期有天主教，其间不能排除还有回教，但谈到宗教信仰，释道二教仍是主流。

（1）朱元璋的宗教信仰

关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宗教信仰，是近些年讨论较为热烈的话题。朱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继亡殁，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不久起兵造反，曾投靠出身明教的小明王韩林儿，成功后建国号为“明”，亦与此有关。此二事人所熟知，无须多说。前者系为生活所迫，后者带有利用性质，固然不能作为朱元璋信奉佛教或明教的直接证据，但也不能就此否定朱元璋信奉佛教或明教，关键要看朱元璋建国后的表现。19 世纪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勒卡普皇宫档案中发现了波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于 1516 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文写的《中国纪行》一书[1]。该书记载作者本人于 1500 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来华游历的见闻。由于作者是穆斯林，书中用了较多的篇幅介绍明朝伊斯兰教的情况，特别提到明朝皇帝重用穆斯林文武官员，以及这些人对明朝开国的贡献。此书被翻译为英、德及新波斯文本出版后，引起了多方关注。台湾回族学者马明道先生受该书启发，进行研究和考证，不仅认为朱元璋、马皇后及其家族和亲戚均为回回，明初开国功臣相当一部分也均为回回，还认为明朝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大都信奉

1 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岳家明译：《中国纪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

回教亦即伊斯兰教[1]。此说提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然而，此说实际难以成立。这只须节引《明史·李仕鲁传》的有关记载就能说明问题：

> 李仕鲁，字宗孔。……帝（指朱元璋）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李仕鲁字宗孔，从名与字来看，自是醇儒，也自应以“辟佛”为己任。吴印、华克勤，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〇谈仕宦，指出“左布政使吴印、华克勤，俱以僧”进。《明史·文苑·赵埙附张孟兼传》也说：“布政使吴印者，僧也，太祖骤贵之，宠眷甚。”朱元璋信奉佛教是毫无疑问的。

（2）明武宗的宗教信仰

关于“正德皇帝”明武宗，过去谈得较多的是他与李凤姐的“游龙戏凤”故事，鲜见有人关心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也是前引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首先提出来的。该书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又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决定的。”从作者来华游历的时间推测，书中所说的“皇帝”都是指明武宗。藏族学者才让先生针对明武宗信奉伊斯兰教说，指出明武宗实际信奉的是藏传佛教，也就是喇嘛教[2]。但此说也不确。要解释这个问题，得先从元代说起。元代的西藏仍称吐蕃，属于中央宣政院辖地。这从《元史》吐蕃不入《外夷传》，其国师八思巴等入《释老传》，其事务入《百官志三》宣政院，即可看出。明代的西藏称吐蕃或乌斯藏，《明史》入《西域传》，不属中央直接管辖。因此，元、明两代对于吐蕃，内外有别，态度不同。元代对于吐蕃僧人，有种种禁令，如：禁持军器，禁止随意至京师，往还者也禁止驰驿。等等。《明史·西域·乌斯藏大宝法王传》则说：“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因而自太祖以下，各代皇帝对西来番僧、法王，均极为优宠。这都是出于政治考虑，并非宗教信仰。至于武宗，则又当别论。同书《李东阳传》说武宗“大兴豹房之役，建寺观禁中”。这里“观”专指道观，“寺”则兼指汉藏佛寺（如《杨廷和传》说武宗暴死，廷和主持遣散“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总不能说武宗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又信奉道教和汉传佛教吧。武宗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变着法子玩乐。根据现代理论推测，武宗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世界观是虚无主义，他是不可能有什么宗教信仰的。

1 马明道：《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台北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1984 年。

2 才让：《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 年第 2 期，23 — 30 页。按：才让还撰写《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 年第 3 期，14 — 19 页。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52-353 11-2-14 下午5:23

（3）妙一飞玄真君明世宗

前面谈到宋徽宗尊崇道教之笃。历史上可与宋徽宗一比者，只有“嘉靖皇帝”明世宗。《明史·佞幸·邵元节传》说：“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可见他从嗣位之初就迷信道教。他亲信的道士，前有精通祷祀的龙虎山上清宫的邵元节，后有精通符水的黄冈人陶仲文，此外还有精通烧炼的合肥人段朝用，精通扶鸾的不知籍贯蓝道行，精通道家神名的嘉定人龚可佩，可谓来自五湖四海。他迷信道教到丧失理智，是在“壬寅宫变”之后。同书《陶仲文传》说：“帝自（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 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或许大难不死，更觉生命可贵，才有此大的转变。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他分别给皇考、皇妣、皇后等都敬上了大帝、元君、帝君等极其冗长的道号；同时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字数较宋徽宗的“教主道君皇帝”还多。还有很多尊崇道教事迹，人所熟知，无须多说。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四年不上朝，不理国家政事。《明史·世宗纪》赞曰：“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馀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2. 清宫廷的不宗一教

北京故宫关于清宫宗教遗存甚多，除了大量的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宗教文物，还有祭祀萨满的坤宁宫，祭祀城隍的城隍庙，崇奉道教的钦安殿、玄穹宝殿，尊崇藏传佛教的雨花阁、宝华殿、宝相楼、吉云楼、佛日楼、梵华楼等 20 多处佛堂。然而，清宫廷实际是不宗一教。譬如：

（1）关于道教

若论清朝皇帝与道教关系最为密切者，恐怕莫过于世宗雍正。今存《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七有《烧丹》诗，卷一七有《紫阳道院碑文》。雍正生病时，也确曾请过道士为他炼丹，并经常服用此类“仙丹”。最后暴死，也恐怕与服用此类“仙丹”有关。但这都不能说明雍正信奉道教。《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全三十卷，除了一首《烧丹》诗，还有很多其他咏物诗；除了一篇《紫阳道院碑文》，还有《昭忠寺碑文》、《崇恩寺碑文》、《报恩寺碑文》、《天竺寺碑文》、《十方普觉寺碑文》、《普陀山普济寺碑文》、《普陀山法雨寺碑文》等很多佛寺碑文。至于炼丹、服丹，那是“病急乱投医”，人之常情，不足为怪。清朝皇帝对于道教，表面看也是极为尊崇。如：《清史稿·职官志二》僧道录司条记设官有“龙虎山正一真人，正三品”；并于顺治八年“授张应京正一嗣教大真人，掌道教”。同书《礼志七·嘉礼一》大宴仪条有专门的“正一真人来朝”的宴仪。《乐志一》总论规定“正一真人宴奏《上清碧落》”。这都是为了管理的需要。实际上却是很有看法的。如：同书《世祖纪》顺治三年七月条记“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符四十幅”，帝谕曰：“致福之道，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其置之。”《乐志一》总论乾隆六年条先说：“禁道士充太常寺乐员。”接着说：“初，明乐舞生多选道童，世祖定都，沿而用之，羽流慢亵，识者慨焉，至是其弊始革。”《职官志一》礼部附乐部乾隆七年条说：“诏禁太常乐员习道教，不愿改业者削籍。”《乐志五·乐章三》附筵宴条说：“宴正一真人《上清碧落》乐章，光绪中停止，词俚不载。”

（2）关于天主教

若论清朝皇帝与天主教关系最为密切者，恐怕莫过于世祖顺治。如所周知，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始于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入华。《明史·外国·意大里亚传》载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上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据说“帝纳其言”并有所行动。说明明代是将天主教等同“左道”，而国家对于“左道”是有“禁令”的。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于明崇祯二年入京，曾参与纂修《崇祯历》。满清入关，顺治元年，汤若望又奉命主持纂修《时宪历》，并执掌钦天监事。当时顺治皇帝年仅六岁，还不谙世事。此后稍长，才与汤若望颇多接触，向汤若望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学习一些天主教教义。但仅此并不能说明顺治皇帝信奉天主教。今存《世祖章皇帝圣训》全六卷，也无关于天主教的片言只语。此后又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入京，执掌钦天监事。《清史稿·南怀仁传》说：“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馀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迨停西洋人入监，未几海禁弛，传教入条约，新旧教堂遍内地矣。”说明清代对于天主教也是有“禁令”的。学习西方科学与信奉天主教毕竟是两回事。

（3）关于藏传佛教

若论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关系最为密切者，恐怕莫过于高宗乾隆。北京故宫关于清宫藏传佛教遗存（包括建筑和文物文献），绝大部分都是乾隆时期留下来的。但这些也都与信奉藏传佛教没有关系。《清史稿·太宗纪》记皇太极曾“禁国中不得私立庙寺，喇嘛僧违律者还俗，巫觋星士并禁止之”。并载皇太极谕曰：“蒙古深信喇嘛，实乃妄人。嗣后有悬转轮、结布幡者，宜禁止之。”对于蒙古信奉藏传佛教直斥为“妄人”。这是有清一代的祖训。对此，乾隆皇帝是理解尤深的。他于登基第五十七年（1792 年）御制《喇嘛说》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立于今雍和宫大殿前院，阐明满清对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政策，强调“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和“安藏辑蕃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重要性。全文约有 2500 字，都是政治层面的考虑，与宗教信仰毫无关系。

（三）支撑组织及单位

北京故宫有关宗教学研究的支撑组织与单位，目前还只有一个，这就是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挂靠北京故宫宫廷部。在此之前，北京故宫从 2005 年开始，已经做了很多关于藏传佛教的工作。前面谈考古学时对此曾有简略介绍。这些工作包括从事文物调查、举办学术会议和举行学术讲座等。北京故宫网站已有十分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赵中男）

DA10070282-13-P330-355-CS4.indd 354-355 11-2-14 下午5:23